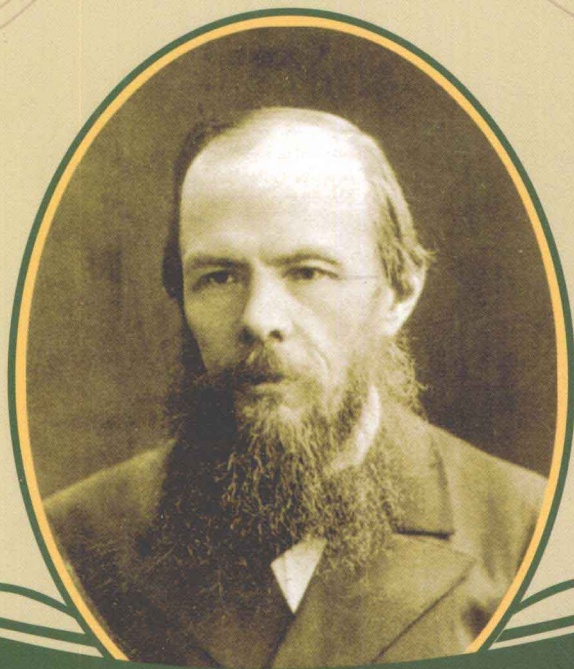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亨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曾 嘉 著

炼狱圣徒

下 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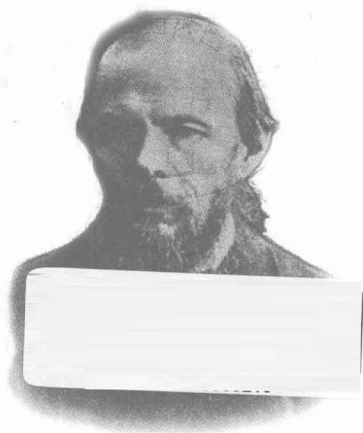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炼狱圣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曾 嘉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 [127] 第四章 乱云飞渡

- [127] 一 大论战
- [149] 二 缪斯的旋律
- [157] 三 对理性的诘问
- [174] 四 爱情缤纷

❧ [208] 第五章 风雨兼程

- [208] 一 罪与罚
- [221] 二 天缘
- [236] 三 流浪的赌徒
- [251] 四 美之夭灭

❧ [259] 第六章 落日辉煌

- [259] 一 港湾
- [266] 二 宁静的火焰



〔273〕 三 “虚无”与“瓦解”

〔278〕 四 信仰的痛苦

〔289〕 五 谁的眼泪在飞

❧〔293〕 主要参考书目





第 4 章

乱云飞渡

一 大论战

10年,远离俄罗斯之都转眼就是10年!

10年,物换星移,俄罗斯仿佛已从一个时代到了另一个时代。涅瓦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别林斯基的身影,果戈理也已去了天国;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志和写下的《往事与随想》,正在国内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屠格涅夫已是俄罗斯首席小说家,可他总是愿意旅居在西欧;刚刚出版了《奥勃洛摩夫》的冈察洛夫与刚刚发表了《大雷雨》的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声誉正如日中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勃夫等文坛新人的文学观点正引起广泛争论……

全国的政治气氛非常活跃。沙皇尼古拉一世1855年驾崩以来,新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倾向。整个俄国上上下下都处于一种骚动、亢奋的变革冲动之中,寻找新的道路,追求新的生活,提出新的思想,教育改革、陪审制度、农民问题……一切都在酝酿,一切都将有新的开始。政府对日益增长的舆论压力做出了让步,出版物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书报



检查机关的压制,四五年中新创办的报刊便有150家之多。“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发配、严刑拷打、愚昧无知的营房正在倒塌。”一桩重大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正在酝酿,1857年末,沙皇签署了关于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安排农民生活的诏书,在此之后,俄国报刊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论废除农奴制这一迫切的时代问题。在这之前的数百年内,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只能保持缄默。当然,如此重大的社会改革不可能不触及一些达官贵人的利益,因而,农奴制改革也遭到了一些要人的无声抵制。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尖锐的危机。

即使在遥远、偏僻、闭塞的塞米帕拉金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时代的这种急剧变化。现在终于回来了,回到了俄罗斯的心脏,已迫不得已沉默了近10年的作家以一种亢奋激越的心情,迫不及待地要重返生活,重返紧张、热烈、疯狂的文学生活。似乎是想把自己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追回来,重新出现在文坛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但没有任何颓唐消沉和悲观失望,反而看上去比以前更富有朝气与活力。

还在塞米帕拉金斯克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在信中与哥哥米哈伊尔商量创办一份杂志。当时正把一家烟草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的米哈伊尔,经过一番犹疑和斟酌,终于1858年接受了弟弟的建议,申请创办了一家文学和政治性周刊《时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亲属中,长兄米哈伊尔是他最亲近的一位,但他们的性格并不相同。米哈伊尔只是在青少年时代迷恋过诗歌,相信自己具有诗人的天赋;过早的结婚以及婚后沉重的家庭负担使他很快便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抒情诗,成了一个文商兼顾的两栖男人。作为文人,他曾是彼得堡几家小型文学刊物的撰稿人,既写小说,也撰评论,后来还曾翻译过席勒的《强盗》、《唐·卡洛斯》以及德国中世纪的民间故事集《列那狐的故事》。米哈伊尔虽亦拥有过激情,但总体看来,却是一个冷静、内向、沉稳、谨小慎微的兄长、丈夫和父亲。在狂风暴雨般的1849年,他也曾随弟弟一起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并因此被捕,但由于他参加活动时,只是坐在一边静听而从未发表过自己的言论,因而没多久便被释放了。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米哈伊尔根本不可能将一份文学和政治性刊物经营得如





同他的烟厂一样有声有色。创刊一年多了,《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少得可怜,篇幅还不到4个印张。

1860年春,这份刊物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突然获得了盎然生机与虎虎活力。刊物的法人代表米哈伊尔负责印刷、发行等事务性的管理工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当仁不让地成了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者,他重新制定了刊物的方针与宗旨,迅速调整了版面内容,使《时代》很快变成了一份篇幅增加到30个印张、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型月刊。

1861年9月,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同时刊登在《时代》、《祖国之子》、《北方蜜蜂》、《星火》等刊物上的《启事》,既是《时代》杂志调整后的纲领性宣言,也是该杂志步入全国大型重要期刊的标志。

《启事》宣称,《时代》杂志旨在促进社会意识中国家发展新原则的形成——使俄国文明阶层顺从人民这一丰厚博大的根基,与民众中潜在的巨大力量结合起来:

自从彼得大帝实行改革以来,人民群众同我们这个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只有过一次结合,那便是1812年^①;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我国人民表现得多么出色啊!……我们终于确信,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我们的任务便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我们预料,我们未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雄辩滔滔的宣言,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当时俄罗斯一些最迫切问题的答复,也是其“根基主义”的第一次明确阐述。

^① 1812年,俄罗斯第一次卫国战争爆发。





“平民仇恨贵族”，一小群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脱离与不协调，这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0 年苦役中所得到的最重要也是最惨痛的个人体验。他从这种体验出发，认定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只是一小群脱离民众的知识分子虚无缥缈的理想。脱离民众便是失却根基，民众便是根基。由此，他声称，有教养的俄国文明阶层的成员应该结束与人民长期脱离的状态，接近人民，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回归到祖国的“根基”上来。他们应该教会人民识字，向民众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挖掉阶层之间的壁垒；而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自己已经丧失而由人民珍藏下来的“宽容”、“博爱”、“全人类团结”的理想。

要走向人民，“如何理解人民”便成了“我国最重要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自己对下层民众的切身体验出发，反对贵族知识分子把人民看做是“愚昧的”、“固守陋习的”、“沉默的”、“冷漠的”“一群”，声称俄国民众自古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世界观的道德基础，这些道德基础牢牢地扎根于他们朴质的、生气勃勃的感情中。他强调，人民群众的道德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可靠的准绳，俄罗斯的未来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因为他们有着博大深沉的信仰，有着坚忍顽强的精神，有着温顺谦恭但同时也活力四射的性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土地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是从土地来的，比如自由、生活、名誉、家庭、孩子、秩序、教会，总之一切珍贵的东西都是如此。”因此，他说，“如果想使人类从根本上变化，把人们由野兽变成人，那就给人们以土地。”从人民落实到土地，他的社会政治主张的基本轮廓便出来了：俄国有农民村社这样一种理想的经济组织，这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唯一需要做的便是，通过农奴制改革，还土地于人民。此后便会有文明阶层与农民相结合、沙皇与民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

1861 年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农奴制改革法令，其本意原是要对各阶层进行安抚，但实际上由于改革措施的不彻底而未能满足任何人的要求，结果却反而激化了矛盾，使社会各阶层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俄罗斯进一步陷入了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在沙皇发动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的 60 年代初，俄罗斯文化界空前活跃，各





种思潮风云际会,各种报刊相互之间的攻讦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时代》为阵地,从鲜明、系统的“根基主义”立场出发,参与了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社会思想大论战。

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紧迫的矛盾与危机,“百家争鸣”的俄罗斯文化界当时有三大文化派别最为引人注目。“斯拉夫派”代表着僵化、保守、顽固的大贵族阶级的政治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一切改革,坚持所谓“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正统国民精神”,主张俄国应该回到自己的、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老路上去。“西欧派”代表着新兴资产者和开明贵族的政治立场,他们与“斯拉夫派”针锋相对,认为俄国应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废除农奴制,限制专制政权。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持有者们推崇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只要求改良,不主张革命;只要求通过改革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劳动力,而不主张摧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革命民主派”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主张彻底解放农民,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通过发展“村社”经济,最终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接受过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们清楚地看到沙皇专制政府不可能彻底解放农民,因而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准备发动农民起义,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沙皇统治。

扛着“根基主义”大旗重返文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0年代俄罗斯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是以“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的。他既不同意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的西欧派自由主义观点,更不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等人把持的《现代人》杂志所宣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也与《日报》的阿克萨科夫等人的斯拉夫主义主张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可正因为这样,《时代》也才陷入了与多家报刊论战的重重包围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欧派的最大分歧在于俄罗斯是否应选择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和模式。这一分歧的两个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否值得肯定?俄罗斯是否适合于资本主义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第一个问题远未来得及做出系统的论述之前,便有些急



不可待地对第二个问题做出了匆忙却也是坚定的回答：俄国与西欧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有着实现本民族民众特有的道德、宗教理想的村社，俄罗斯民众身上有着自然本身赋予的与沙皇为首的统治者“和解”并“融为一体”的精神禀赋，因而俄罗斯不适于西欧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入为主的顽固立场，才使得当时很多人几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归斯拉夫派。

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很久，俄罗斯思想家就面临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普希金和部分十二月党人曾为之深感不安；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在40年代就曾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和抨击。可尽管如此，在1861年改革之前，确切说是这种改革所带来的俄国社会资本主义因素大大增强之前，俄国文化界还没有、也不可能面临作为社会生活现象已经存在于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因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模式在那时主要是作为非俄国的、西欧现实生活的现象或纯粹从西方舶来的文化形态，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审视和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幻想周游欧洲。1862年6月，他的这一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尽管行色匆匆，仅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便走马观花地游历了柏林、德累斯顿、威斯巴登、巴登巴登、科隆、巴黎、伦敦、卢塞恩、日内瓦、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维也纳等主要城市，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收获却依然是极其丰富和巨大的。除了7月份在伦敦会晤了闻名遐迩的思想家、政治家、作家赫尔岑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巴枯宁，他还对构成资本主义标本的这些大城市的人和事进行了紧张的、扫描式的观察与研究。这种实地观察与研究，使他在回国之后很快写成了长篇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载《时代》1863年第2、3期）。在这篇长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文明第一次做出了系统、明确的评判。从此之后，其所有的小说创作和随笔文字中便总是响彻着这一评判的回声。

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兴致勃勃地去描写古老欧洲的名胜古迹（想描写也不可能，因为他当时几乎就没去参观任何著名的历史古迹或闻名的自然风景），相反，他描写的只是欧洲的一些阴暗面。针对传统的自然风景描写和名人肖像描写，他的这篇随笔游记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西方大城市中的





悲惨事件以及大城市中那些纵酒无度、行为不端、吸食毒品的各色人等,并且夹叙夹议,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辛辣讽刺和决绝否定。

作者痛斥资产者的庸俗与怯懦:

一般说来,资产者并不十分愚蠢,但他们的思想偏狭,似乎是断续不连贯的。他贮积许多现有的概念,好像贮积柴薪准备过冬一样,他真想带着这些概念一直活到一千年……奴性越来越侵蚀到资产者的天性里去,越来越被视为美德……资产者有着许多与生俱来的奸细作风,并且不是普通的奸细作风,而是精巧的奸细作风,天职般的、达到艺术境界的、有着一套科学方法的奸细作风。

作者称,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归结为一句话便是“死后吉凶祸福在所不计”;认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饥寒交迫所引起的小偷小摸受到惩罚,而利欲熏心却善用“美德”掩饰自己的窃国大盗却反而受到奖励:

偷盗是丑恶的,卑鄙的——犯了偷盗,应被罚做苦役;资产者愿意宽恕许多事情,却不肯宽恕偷盗,即使你或你的孩子饿死也罢。可是你由于美德而偷盗,那时就会把你的一切过错都宽恕了。可见,你是想发家致富,积蓄许多东西,也就是尽自然和人类的责任。这说明了为什么法典清清楚楚规定出两种条款,分别对待出于低级目的即为了一块面包而引起的偷盗和出于高尚的美德的偷盗。

作者指出,上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血流成河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并没有开辟出人类历史的新时代,而仅仅是一种“专制制度的更新”——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且“新的胜利者(资产者)比先前的专制统治者(贵族)可能更坏”。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不过是革命时的漂亮口号,



革命后的一堆废话。

什么是 liberte^①？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内一律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没有百万钱财的人，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

西方人把博爱解释成人类的伟大推动力，而没有悟到，要是现实中无从找到博爱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博爱……无论如何一定得制造出博爱来。但看来博爱是不可以制造的，因为博爱是自己形成、出现的，存在于自然之中。而在法国的自然之中，总的说在西方的自然之中，不存在博爱，存在的是个人的原则、孤独者的原则……从这种重视自我中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博爱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由的那个高度凝缩的公式里，既包含着自由之不可能，也点明了自由底下潜藏着不平等。这份“不可能”和“不平等”，只能将人驱赶到一种冷酷的选择之中：或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人，或者做一个任人所为的人，即或者做奴隶主，或者做奴隶。大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冷酷的选择，于是人与人便被孤立、被分裂、被断开，于是便有了阶层和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即“一切人仇恨一切人”。既然仇恨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实质联系，“博爱”又从何谈起呢？在其这样的一个公式和推断里，包含着他在日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和形象。《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即是主要因了不得不承受那个冷酷的选择才去犯罪；而《少年》中的主人公亦是为了避免“任人所为”，才在那里梦想攒聚百万家财。

① liberte，法语单词，意谓“自由”。





在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称之为“日神”。在对“日神”的描写中,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那令人炫目的繁荣与华丽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贫民窟里的赤贫与苦难。在那些“白皮肤的黑人”(即工人)住宅区,“饥饿的灵魂常常就会呆木、顺从、屈服,到杜松子酒和淫乱中去寻求解脱”,“大家喝得醉醺醺,但没有欢乐;他们是阴郁的、沉重的,有点古怪地沉默的”。

夜晚,在这个区的几条街上,挤着成千上万的妓女。街道被煤气灯照亮着,这种光景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用镜子和金箔装潢着的咖啡屋,每隔几步就有一家。这里既是碰头的地方,又是宿泊之所。挤到这人群中来,甚至觉得森然可怕。这人群好生古怪。这里有老太婆,也有你忍不住要停步凝视的美女……这一大群人都饥渴地想猎取些什么,老着脸皮,遇到第一个人就不顾羞耻地直扑上去……可以听到辱骂声、争吵声、拉客声和还很胆怯的美人儿的悄悄的、恳切的低语声。……在楼上的走廊里,我看到一个姑娘,我简直惊异地站住了:我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美女。她和一个年轻人一起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这人似乎是一位有钱的绅士,而且显然是游艺场上的稀客。他们的谈话若断若续,常常被长时间的沉默所代替。她显得郁郁寡欢,面容温柔而含蓄,妩媚动人得有些骄傲的眼光里透出一种抑郁不乐、沉思忧虑的表情。我觉得她有肺病,而且她在感情和精神的发展方面,肯定超出一般不幸的妇人之上。可是,这期间,她喝了杜松子酒,让年轻人付了钱。最后,他站起身来,与她握了握手,离开了游艺场;而她,由于喝酒过多,苍白的两腮泛起片片红晕,也起身离去,消失在那些做生意的女人堆里。……我看到过一些带领自己年幼的女儿们去做生意的母亲。一些年仅12岁左右的小女孩会拉住你的手,硬叫你跟她走。在街上的人群中,我看到一个顶多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她衣衫褴褛,浑身肮脏,赤着脚,骨瘦如柴,显然经常挨打受骂:破衣衫下露着累累伤痕。她懵懵



懂懂地走着，并不急于到哪儿去，天晓得她为什么要在人群里闲逛，也许是肚子饿了。谁也不去注意她。但最使我吃惊的是，她走路时脸上流露出十分痛苦和悲观绝望的神情。瞧着这个不知挨过多少人咒骂的和陷入绝境的小人儿，我感到心如刀绞，万分难过。她一边走，一边摇晃着蓬乱的脑袋，仿佛在思考着什么，两只小手向外摊开，打着手势，后来又突然把双手合在一起，紧压在赤裸着的胸膛上。我趑回去，给了她半个先令，她接过银币，带着胆怯而惊愕的神情，粗野地看着我，尔后撒开腿便往回跑，好像是生怕我会把钱再从她手里夺回来似的。

在妓女成堆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个美貌异常、心灵高傲、内心充满无限悲愁的女郎，她在这座有着许许多多淫棍和阔人的大城市中，竟然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妓女！此后，他又三言两语地叙述了自己与一个小女孩的一次不寻常的遭遇。在狂饮无度、冷酷无情的人群中，那个才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脸上流露出来的居然是一份哀痛的、无可奈何的、难以名状的绝望神情，这怎不让人感到悲怆震惊？在这样的描写中，资本主义吞噬美、摧残纯真的罪恶实质立刻便跃然纸上，得到了入木三分的揭示。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疑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是一种彻底的绝对的否定，他丝毫不肯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对于被推翻的封建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他声称，“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所有的人都是私有者或是想成为私有者”，“所有的工人在灵魂里也都是私有者，因为他们的理想就在于成为私有者，尽可能多地积蓄钱财。”由此，他做出推断，即使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也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或社会主义的胜利，因为政权只不过是这些“私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些“私有者”手中。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私有者”或“资产者”这样的概念推及到所有的巴黎人、所有的法国人、所有的西欧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成为私有者乃西欧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西欧人的一种天性。在不辞辛劳地做出如何推断之后，他下面将





要做出的结论便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培育出了一切阶层“精诚团结”的可能，俄罗斯的文化精神不是个人的原则，不是掠夺的原则，不是孤立、分离、仇恨的原则，而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东正教的总体性、沙皇的总体性。在东正教和沙皇庇佑之下的俄罗斯人，就像一个大家庭，能够避免阶级的断裂与对立。这也就是说，俄罗斯可以避开资本主义文明，俄罗斯不应该走向腐烂和堕落的资本主义体制。

后来，时光的推移很快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其俄罗斯可以避开资本主义文明的田园诗般的希望，原来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1878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不得不沉痛地写道：“农奴解放后，时间流过去了。可是结果怎样呢？乡机关混乱得不成样子，世风浇薄，整天喝酒，开始赤贫化，财富集中到富农手里，也就是开始形成欧洲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873年，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我们正经历着很可能是俄国人全部历史中最混乱、最困窘、纯属过渡性质的、真正决定命运的时刻。”“原先的世界、原先的秩序已一去不复返了”，“可奇怪的是，旧秩序在道德上的许多阴暗面，如自私自利、厚颜无耻、唯唯诺诺、相互隔膜、卖身投靠等，不仅没有随着农奴制生活方式的消亡而消失，反而好像变本加厉，越发不可收拾了。”“到处飞舞的碎片”全是“垃圾”和“虚伪”。总之，“有文化修养的人”消失了，被共同的传统和家族的规矩联结起来的那种稳定而井然有序的家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相信“个人至上”以及“仇恨”与“掠夺”原则的“野”人，是丧失了内部联系和牢固的家庭传统、为“孤立”、“分离”、“断裂”原则所控制的“偶合的家庭”。

既然俄罗斯也难逃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而资本主义文明又是那样的腐败、堕落、野蛮、黑暗，那么人类的现实该是一幅怎样可怕的景观？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田园诗梦想变成乌托邦幻影的时候，他的心头对人类怎能不充满着阴郁的冷嘲和绝望的哀鸣？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支柱如果不是走向宗教又能走向哪里呢？在60年代上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评判之中，事实上便已经包含着后来他对人性及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思想逻辑。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气氛为什么总是那么惊慌仓皇，充斥其作品之中的为什么总是那么多的人类痛苦，其笔下永远在追寻着什么东西的人物何以总是有着无穷的孤独、苦闷、病态和愤懑，其笔下的社会何以总



是道德权威丧失殆尽、道德约束土崩瓦解,其笔下的家庭又何以总是一些“偶合的家庭”。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除了不相信他们从西欧社会主义者那里舶来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之外,便是反对他们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手段——革命暴力。在否定了自己早年也曾相信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政治理想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革命暴力除了能带来社会对抗和人类灾难,此外便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上宣示出来的这种对革命暴力的否定态度,自然激起了正在以书刊检查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号召举行革命暴动的《现代人》杂志的愤怒声讨。

1862年5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使他惊诧不已的革命传单。这份传单题名为《新生的俄罗斯》,署名“青年俄罗斯”。它号召人们立即起来举行社会革命,杀死沙皇,杀光皇族,斩尽所有的官吏、神甫和地主。在楼房内、在大街小巷、在广场、在各个村庄与敌人展开肉搏;哪怕自己鲜血横流,也一定要建立共和国,使工厂变为公有,使妇女拥有政治权利,废除寺院,取消家庭和婚姻。传单中说:

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将举起伟大的旗帜,未来的旗帜,红色的旗帜。我们将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冲进冬宫,把那里的人统统杀光……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拿起斧头!”到那时谁要是不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谁要反对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以一切手段消灭之……

这张传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气愤和痛心。那几天,彼得堡正好发生了火灾。一处处巨大的火焰升腾而起,整个城市都在燃烧。恰巧又刮起了大风,所以救火工作几乎无法展开。整片整片街区化为灰烬,白夜变成了血红的夜,成千上万的灾民在大街和广场上惊恐万状地狼奔豕突……城里一时间各种谣言纷起。

官方将大火和传单联系在一起,怀疑大火系革命党指使学生所为。于是大火





未熄之前，大规模的搜捕便先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各种流言蜚语弄得心神不安，他坐下来写了一篇文章，以有力的证据驳斥了官方关于火灾与传单、火灾与学主联系的猜测。随后，他决定必须跟革命党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谈一次，彼此开诚布公地交流一下看法。

车尔尼雪夫斯基亲自为他开了门，先是露出了惊诧的表情，但很快又转为亲热和高兴，将他领进了书房。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瞧这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传单递了过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过传单，看来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

“难道您认为我跟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吗？难道你认为我会参与这种传单的拟写？”

“不，恰恰不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我以为我勿需对此多加解释。我想说的是，为了防备万一，您应该尽可能地制止他们。您说话对他们是有分量的。”

“可我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这一点。不过这不要紧。您完全可以不用与他们本人直接谈，您只要在某个公共场合公开批评一下他们就行了。你的谴责会传到他们耳朵里去。”

“不见得会有什么作用。况且这种现象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免的。”

“可这会把事情搞糟，对大家都有害。”

他们谈了很多。两个多小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辞。一星期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回访。

1862年的彼得堡大火，后来在其小说《群魔》中得到了反映：

夜间的大火往往会产生一种使人激动而又开心的效果。焰火就是据此发明出来的，不过焰火的火焰总是优美而有规则的，而且十分安全，给人留下轻松有趣的印象，犹如喝了一大杯香槟酒。真正的火灾却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恐怖感和某种个人的危险感，以及夜间大火所产生的某种令人开心的效果，会在旁观者身上引起脑震荡，而且似乎在向他自己的破坏本能挑战……

